

五四时代与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起源^{〔*〕}

——以陈独秀、李大钊、张闻天、恽代英等现代作家为例

杨洪承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考察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起源,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历史话题。她与近现代中国思想革新的“五四时代”重要文化历史语境,及以陈独秀、李大钊、张闻天、恽代英等为代表的一批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先觉者密不可分。她的生成既是顺应着历史社会政治革命大潮的自然涌动,又反映出新文化新文学多元思想资源有意识的聚合和建构。立足现代文学大视野和革命整体观,通过历史发展的必然革命和身份并不单一的现代作家,探寻文学与革命最初联姻的由来,展示贴近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生的原貌样态。重新辨析现代中国革命文学起源的内在思想逻辑线路,正是这批现代作家感应时代脉搏、汇聚多元资源,在心与身、言与行的互动过程中,呈现了革命文学源于同一性基调的使命感、忧患意识的社会关怀,表现了革命文学本体世界差异性活力的不同观念、不同资源、不同表现之多样形态。

〔关键词〕五四时代;现代作家;革命文学;生成起源;思想逻辑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5.002

通常文学史1915—1925年的五四时期,人们又约定俗成称为“五四时代”,就在于五四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断代,而且是有着传统向现代变革的文化涅槃。这一时代诞生的历史链条:远有1840年的反抗外来帝国主义的鸦片战争,近有1911年的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这中间有1895年前后,一场失败的甲午海战引发朝廷被动应对的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与此紧密相关联,多少可见时间与空间交织的丰富性、复杂性。正是这一系列历史发生的自觉与不

自觉的政治社会事件,助推了五四时代重大思想资源的构成:1915年的《青年杂志》,旋即改为《新青年》的问世,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之意义,是在过往战争、武装革命,乃至立宪改良变革的前车之鉴下,以期获得现代中国人真正意义的独立,真正找到现代人立足的价值观和认识论,即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1919年“五四”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识,是现代社会政治触发的伟大民族的爱国运动,更是“新人”的觉醒,强调个性独立和自由的思想启蒙运动。两

作者简介:杨洪承(1954—),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社群结构与作家谱系研究”(批准号:14AZD080)的阶段性成果。

个运动的共同体都源于一批先觉的知识者,他们既是实实在在的青年的爱国青年学生,又是具有时代象征意义的“青年”。因为“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1]以呼唤新青年为主旨的“五四”,亦即后来被称为近现代中国历史转折中的一场思想文化革命。她注重“新人”独立思想的张扬,并非热衷于仅仅依靠暴力推翻一个皇帝,或者“物”之层面的“利器”,而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文化革命。因此,这时期提倡科学实证,反对主观臆断;强调自然与社会的进化,反对循环调和;尊重创造,反对守旧;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等一系列深层的思维观念的变革。虽然二元对立式革命不无有些简单化,但是也有革命的某种策略。一个时代的开启有文化传承和历史赓续的自然形态,更不可缺少锻造“革命”的新人新观念。因为“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2]可以说,正是“五四”的主题与精神,乃至五四革命的方式方法,使得我们考察现代中国文学中的革命文学生成,与五四思想启蒙如何建构“新人”或“新青年”之间,重新发现了一条内在关联的逻辑线路。

一、陈独秀与五四新文学“革命”的举措

五四时代的思想文化革命本质上是一场“人”的革命,是一大批先觉的知识分子引领了近现代中国的朝代更替以及民族危机中的思想文化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的历史转向。他们的先觉和引领就在于并非完全线型思维的历史转向,而是将民族国家、思想文化、政治革命的核心理念更多地融合在一起。这样五四时代出现了一批倡导文学革命的现代作家,但实际上他们思想观念的变革与践行,更多地集思想家革命家于

一身。他们率先提出新文化新文学“革命”的举措,既是方法策略,又是思想、文学的本身。比如,陈独秀(1879—1942年),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领导者是无有异议的,而很少有人将其与后来倡导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作家联系在一起。要真正深入了解1925年之后狭义的现代中国革命文学之蓬勃兴起的过往文学史认知,不能不从这之前的广义“革命”即革命文学的文化语境及其演变路径上进行梳理和辨析。找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源头,无论是考察时间节点的五四,还是分析内容层面的文学文化、思想革命、国家民族的范畴,陈独秀都是一位绕不开的重要的历史人物和现代作家。为此,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批早期现代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与社会实践,尤其他们身上独有的革命情绪—革命意识,乃至革命的行为方式,呈现的不只是新文学最早期的现代性要素,或五四文学革命的催生,更重要的是“革命”与文学同根同源的现代中国发生发展之偶然与必然。还是先以陈独秀为例,他开启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先河,借助《新青年》之阵地,传播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立足达尔文自然观从而衍化为社会观,达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反思。早就有学者指出:陈独秀一代的文化先觉者“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的压力下被推向极端的时候,它便演变成一种以思想为根本的整体观思想模式”。^[3]这里传达的信息是,一种文化思想被提出并成为整体性思想方式,是现实社会迫压使然。1916年陈独秀敏锐地指出:“吾人首当以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青年必怀此希望”。^[4]由此,他呼唤的“新青年”别于“旧青年”,是“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5]之衡量,而且强调根本在于“体魄”和“精神”。作为现代文化思想启蒙的首倡者,陈独秀对于国人精神的建设,已有现代思想史、文化史评述了,无须赘言。倒是从他的思想启蒙的言论中,多少可以分理出

现代革命文学由变革意识奠定的新文学观念,以及革命文学形成的要素和走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现代历史、社会文化交替时代的陈独秀,引人注目地主编了《新青年》,侧重在两个方面主导思想启蒙的话语:一是自由、民主、个人主义;一是革命、国家、共和。前者重在塑造新人的观念思想,后者引导群体的政治实践目标。这一文化思想建构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根基,开创了中国文化和价值的多元时代。更重要的是,在推进这些新文化新思想之时,陈独秀率先注意到文学革命的意义在于破除历代文学之敝,推动社会文明进化,尤其“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然而,陈独秀的“革命”观不只是手段、方式,而且有着与其思想启蒙相联系的文学内容,即“抒情的国民文学、立诚的写实文学、通俗的社会文学”。^[6]在此之前,不乏梁启超、孙中山等一批先行者也认识到一场思想革命的重要性。如梁启超就说辛亥革命“由表面观之则政治革命、种族革命而已;若深探其微,则思想革命,实其原动力也。盖数千年公共之信条,将次第破弃,而数千年社会组织之基础,将翻根柢而动摇了”。^[7]1920年孙中山谈五四运动时也特别说道:“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8]但是,陈独秀应该是现代最早注意到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一体关系的,从而成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酝酿形成的最重要推手之一。还需要强调的是,陈独秀助推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生成,不只是从欧洲引入了“革故更新之义”的革命观念,而且从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看,“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为此,他首举“文学革命”的义旗“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9]在“打倒”“建设”中彰显出五四新文学鲜明思想内容的向度。它以一种新与旧、破与立、社会进化观的基本思维方式,引导着五四时代“新人”的思想观念。陈独秀假文学革命之名,成功地倡

导了一系列新的文化文学革命的核心元素,推进了现代中国思想革命的深入发展,从而也为最初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酝酿生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五四之前,陈独秀就在不断地呼吁,“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10]他是从挽救国家、唤起民众的政治角度出发,是以炮轰、批判一切旧营垒的革命方式,同时展开了以“打倒孔家店”的“伦理道德革命”与文学革命。如果说,晚清以来,孙中山、“同盟会”等一系列社会革命举措,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出现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外部社会条件,那么陈独秀的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之于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发生则有着思想观念和精神风骨的巨大内在驱动力。

二、李大钊与五四新文学苏俄革命的传播

与陈独秀相比,李大钊(1889—1927年)同样作为现代中国第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代表,是他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开拓了苏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中国的宣传。为此,梳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生成的丰富复杂的思想脉络,不能回避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的构成和其影响,特别是他与陈独秀同期思想的内在联系和区别,至于与现代中国革命文学起源的另一种观照。

1918年前后,就在陈独秀积极推进英美自由、民主、人权的革新思想之时,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引领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发展,也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到了推动作用。李大钊对于刚刚发生的十月革命的迅捷反应,本质上是表现为其激进

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革命观的转变和其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走向的调整。当国人普遍还在被动地反思五四之前诸多本民族落后挨打的“革命”，或只沉浸于欧洲文明的启蒙革命之倡导，李大钊却能在一个宏阔的世界视域理解和比较革命的不同，“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19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11]“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20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12]李大钊对俄罗斯革命先觉的前瞻性的认知，最重要的是明确地指出了“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认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无产庶民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13]为此，李大钊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来源，及五四新文学的引导与革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就不无密切地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1918年他曾写有一篇《俄罗斯文学与革命》的文章，指出俄罗斯文学的社会主义色彩和人道主义的发达，鲜明地称赞十月革命时期普希金、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诗人，同情人民，反对暴君，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自我牺牲精神；呼唤“俄罗斯革命之成功，即俄罗斯青年之胜利，亦即俄罗斯社会的诗人灵魂之胜利也”。^[14]正当五四文学革命的中国，不同于胡适新文学的进化观，李大钊明确强调“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新文学运动的土壤、根基，是“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15]这里某种程度呼应了陈独秀欲求建设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更为具体化地提出新文学内容须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即强调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改造之自觉。1919年李大钊联

值主编《新青年》，开辟“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自己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和高度赞誉之外，还阐释了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中浓厚的人道主义和互助主义色彩。他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16]这里明确定位文学与革命的内在关联，突出文学与革命中伦理的因素和人道主义的社会倾向。这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超越了当时一般意义上的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不仅如此，作为五四文学家的李大钊，就其大量随笔杂感散文《青春》《今》《晨钟》之使命》等作品，及《欢迎陈独秀出狱》等不多的几首白话诗创作而言，也应该能够看到他的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初步实践与其信奉马克思主义之追求是完全相一致的。李大钊以开阔的视域比较不同的世界革命，较早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先进的文化理念，积极参与了五四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的建设。他的一系列世界革命观和新的思想主张，对五四新文学自身发展的内涵提升，尤其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形成和演进，注入了最为重要的新鲜的精神活力和思想资源。

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借助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之势，催生了新文学人道的社会的革命文学观念，那么，张闻天、恽代英等革命作家则是在自觉投身社会实践和现实斗争中开始逐渐将革命文学落地。在社会必然进化发展中，无产者、政党、阶级等新的革命话语，激励着五四新文学向着更为坚实的目标前行。

三、张闻天与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实践

张闻天(1900—1976年)作为最早的现代中国革命作家之一，这与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杰出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与理论家等独特经历分不开。可以从

张闻天最早公开发表的一篇政治论文中看到,他是一名率先受到五四爱国运动洗礼的激进青年。其表现为他在学生时代就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军阀政府“空文鼓吹”,我们“切实劝告”“奔走呼号”“奔都请愿”都是无用的,不要去做;我们要“釜底抽薪”,只有“武力政治,强横的中央集权,卖国贼,安福系,腐败的政党,一切废除”。^[17]其革命思想的反对强权、反对封建专制,与陈独秀、李大钊一样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很大,但是张闻天更有自己对革命的理解和认知,在当时他就提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见解。他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铲除士大夫阶级”,“革命的目标自然是去士大夫阶级”;中国革命与“欧洲旧式的革命”不同,“起革命的要是劳农界人(就是工人与农人)”,而工农是需要“有知识的开导”;^[18]革命应该分成两步,即争取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张闻天的革命观一方面是对“劳农”的社会阶层的重视,另一方面十分强调知识分子的引导作用。这正是其革命家与文学家双重身份使然。

五四时期,就在张闻天写出这些革命政治随感、评论、论文之时,他还以极大的热情译介和研究外国文学的理论、著名作家的作品。如1921年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观》、1922年的《王尔德介绍》《哥德的浮士德》《泰戈尔之“诗与哲学”观》等评介长文的刊发,以及法、英、俄、西班牙、意等多国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翻译作品的出版;还在《小说月报》《少年中国》《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新文学创作,尤其关注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之方向。青年文学家的张闻天对于中外文学的浓厚兴趣与其当时早期科学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他一般喜欢那些重视艺术美学与社会人生两者兼顾的外国文学,而译介也偏向选择这两方面较好融合的外国作家作品。比如,他评述王尔德小说《道灵·格莱底肖像画》,这部作品“是对于社会的批评而又是忠实于唯美主义的”,“并不像大众所说的那么不道德,那么病的,那么非社会的”。^[19]张闻天推崇

俄国作家安特列夫的四幕剧《狗的跳舞》,译后他介绍安特列夫笔下人物“毫不疲倦地找寻着人心中所蕴藏着的革命的、反抗的、愤激的、恐怖的、人道的、残酷的、悲哀的、凄凉的种种精神,用了写实的、象征的、神秘的笔墨传达出来,使读者时而愤怒、时而恐怖、时而悲哀、时而怜悯、时而发狂”。并称他的作品是“利剑”,可以“斩掉”使我们“永远不能得自由”的,束缚着我们的“礼教和偶像”。^[20]从张闻天早期的新文学创作,可以见到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这与他短暂的日本生活体验和美国勤工俭学的独特人生经历,与他自觉融入五四时代的社会革命宣传和积极的实际行动密切相关。他明确直言“我们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情意上早感到不安,因不安也早产生了改造的决心”。^[21]由此,同样是写五四文学共同关注的婚姻爱情问题的小说,张闻天192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旅途》中的主人公钧凯不仅是接受了新思潮,充满着理想和炽热的爱的五四青年,而且已经是投身革命军队,从事武装斗争,不惜牺牲生命的革命践行者了。这时期他的短篇小说《逃亡者》与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有着相同的江浙军阀战乱的社会政治语境,也都是描写一家人逃难的故事情节,但彼此作品中作者的关注视点显然不同。张闻天是通过货店老板王六一家的逃亡生活纪实,重在烘托军阀混战的社会动乱和民众的悲哀、愤怒中包含的血和泪。叶圣陶则是通过小学教员潘先生的避难经历,冷静描摹战乱中知识分子灰色的精神心理。当我们读到张闻天1925年写的小说《飘零的黄叶》时,不难发现作品里的知识青年长虹向母亲述说十年艰难人生经历虽然有些感伤,但是其主调是在抒发“在黑暗的世界里为了光明,为了真理而奋斗”之导向已经很清晰了。也正是在这一年,张闻天完成了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到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仰者的转变。可否说,张闻天的革命追求之路与文学兴趣相融合的过程,多少代表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最初生成的一种路向。他也是在五四时代这批侧重倾向思想

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现代作家中,较早在文学创作实践中融入革命的观念和现实生活的体验,提供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最初文本样态的先行者。

四、恽代英与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活动

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初期生成之中,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群体和组织意识的现代作家,恽代英(1895—1931年)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五四前后,他在武汉中华大学就读文科,已是一名积极的学生运动的倡导者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1917年10月,恽代英、冼震等创办了互助社。互助社的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互助社是武汉地区诞生的第一个进步团体,也是现代中国最早的思想进步的社团之一。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恽代英和互助社的成员热烈响应。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四年五月七日之事》《呜呼青岛》的短文,就是1919年5月17日作的传单,当时曾在武汉街头散发,^[22]并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和集会,掀起了武汉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浪潮。1920年2月恽代英和林育南等创办了“利群书社”,4月连续撰文“致少年中国学会”同仁,8月在湖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书社社员都是该会主要成员,11月去安徽宣城师范任教。这一年里,恽代英办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依托研究会和教书团结进步青年,发展革命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都表现出投身革命运动的自觉。尤其重视革命组织团体的建设,热衷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及其积极的社会实践。1921年7月恽代英与林育南、李求实等又在黄冈创建“共存社”,“企求阶级争斗,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23]该社此宗旨与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目标相一致。1923年已经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恽代英,在上海创办了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他任主编时组织了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李求实等一支强大的作者队伍。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恽代英同样关注着文坛和新文学的发生发展,

他以一个社会活动家和革命家的身份,自觉将文学与革命密切地联系起来。

1923年至1925年前后,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八股》《文学与革命(通讯)》《〈中国所要的文学家〉按语》等文章,表现出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视野,寻求五四新文学在现实语境中的新路向。他不是为了赶时髦倡导革命文学,也不是为了自命革命文学家而自居。在五四新文学发生之中,恽代英认为新文学要想受人尊敬应该以“能激发国民的精神”^[24]为准则。而只是热衷论争文学的新旧,或信奉洋八股,“他们亦配做得出革命的文学么?倘若他们做出那些完全不是高尚圣洁感情所产生的所谓革命的文学,那亦配称为文学么?我相信最要紧是先要一般青年能够做脚踏实地的革命家;在这些革命家中,有些感情丰富的青年,自然能写出革命的文学”。^[25]这个时期,恽代英与他同道的邓中夏、萧楚女等一批社会政治革命家一样,正是遵守着一个原则即无论是新文学本身还是文学家个体,都必须走出“象牙之塔”,投身到社会革命的实践中去。“我们不反对人们做新诗人,我们是反对人们这种不研究正经学问不注意社会问题专门做新诗的风气”。^[26]“革命的文学家若不曾亲身参加过工人罢工的运动,若不曾亲自尝过牢狱的滋味……决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27]此时他们大都既是学校的教员,又是军校的政治教官的双重身份。比如1923年前后,恽代英从四川来上海大学任教,同时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学生和编辑委员,并且前往共产党领导的沪西工人俱乐部讲课,也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各种会议。这期间他的演讲、讲课,或撰文基本都集中于学生运动、农村运动和实际的革命活动,以及工农、平民教育等方面。显然对于新文学的要求和革命文学的引导正是他自己参与社会实践的经验体会和思想期盼。

从恽代英为代表的社会实践的革命先驱者身上,可见五四新文学的通俗、写实的平民文学,乃至同情于下层民众不幸的人的文学,在向着更

为关注社会实践的大众人生努力前行。他们强调文学与革命的关联,最重要的是“从自己真正情感为出发点以从事革命的人”,^[28]不是普泛化的同情,或鼓动式的情绪渲染,或仅仅文学形式的变革。“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29]自此,恽代英的革命实践活动与其理解的新文学思想,最具有从五四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走向的代表性。他对内部动因的揭示并不在于革命文学只是随着社会政治变化和党派建设的路线而自然生成,更多反映来自文学主体的作家的身份认同和其角色的多元取向,革命文学的发生和其务实的本体建构,正是源于五四文学面向社会现实人生的内在渐变和转向的诉求。

五、作家与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多元思考

通过对陈独秀、李大钊、张闻天、恽代英等这批作家的文学与“革命”源流的简略梳理,正是试图努力对现代中国第一代先觉知识者多重身份的历史还原。这里既尊重每一独立的个体,更关注他们行进于五四时代自觉的文化共建。同时,他们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多元考察整体的革命观和文学的大视野,这样有了如下现代中国革命文学起源的重新辨析。

其一,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发生,源于现代作家精神主体强烈的社会意识和丰富的文化情怀。在这批作家身上,既有中国传统文人饱满的热情,深厚的旧文学根基,也不乏关心新文学的建设及其创作实践;既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又有青年学生、教师、报刊编辑等多重社会职业身份。他们大都热心于将现实的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活动和喜好的读书写作自觉地结合,并作为自我日常生活的状态。

仅取 1915 年到 1920 年的时段来看,陈独秀 8 月从日本回国后帮助同乡汪孟邹将《中国白话报》改刊为《通俗杂志》之时,开始筹办《青年杂志》(第二卷更名为《新青年》),创刊号上提出“国势

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30]期间与胡适一起倡导了文学革命,又受聘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且进行一系列改革,如将《新青年》变为同人刊物。还创办了《每周评论》并明确其宗旨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31]同时又开始积极创建中国共产党。这时期的李大钊,由章士钊推荐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参与编辑《新青年》,指导成立了国民杂志社,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少年中国学会”,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积极撰稿发表歌谣、杂感等各种文章。此时期的张闻天与恽代英,一个是怀着“科学救国”从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走出来的学生,一个是从接触安那其主义并受其影响的武昌中华大学的文科生,都共同地受到五四运动风潮的鼓动。特别是作为青年学生对社会劳农的认同。张闻天参与并且响应“少年中国学会”倡导的“纯洁、俭朴、实践、奋斗”的信条,组织“工读互助团”;恽代英不仅在武汉最早成立“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而且率先在武汉组织学生市民罢课罢市等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可见正是这些作家特有的多重身份和活跃的思想追求,使过往的文学史家有了简单判断的理由,“五四时代新文学所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革命文学就必然产生了。^[32]同时,也应当承认文学与革命本身确有一体的双重性。陈独秀与李大钊思想先行的立言,崇尚理想、主义而将文学与革命内在要素勾连融合,而张闻天与恽代英践行大于言说,在遵循着务实、俭朴、民众、互助的思想主旨下,引导着立足民生的写实文学与社会革命实践活动的密切关联。以思想启蒙开启的五四时代,从人的文学到面向大众平民互助的现实主义文学,无疑可见文学与革命联姻的必然与偶然,但是并非一定就是后来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了。显然,寻踪上述作家各自的人生轨迹、不同的文学与革命结合方式,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生成演进的线条,才有可能更为明晰、更为客观地贴近历史样态。

其二,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发生,本质上是

作家面临着社会历史、现实生活与文化文学重大转变时的思想留痕。实际上,这批作家思想立场的认同和选择,一方面表现出传统知识结构的沿袭与现代文化的不约而至,并且发生着碰撞和相互浸透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转型和一系列重要政治革命事件的触发更不容忽视。最典型的是甲午海战、辛亥革命,与外来的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合力作用了他们新思想的积极探寻,推动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以及现代中国革命文学自身元素的建设。

1919年陈独秀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33]可见此刻陈独秀对两次世界著名大革命坚定的认同态度,也传达出他的五四新文化启蒙立场的源流。而这时期李大钊从一个温和的改良立宪革命者转向最早涉猎苏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先行者。1917年前后他参与《甲寅》和主编《晨钟报》报刊活动和撰文,1918年7月《言治》季刊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文章,正是李大钊由“自由”中心的立宪革命迅速向着讴歌俄国革命的重要标志。就某种程度说,这也多少呈现了启蒙时代的文学革命向着社会革命文学自身蜕变的一些印痕。同样经历了重要历史变革、传统现代文化的交融、文学与革命选择的张闻天、恽代英,他们更多重视在新思想新文化吸收接纳过程中的反思与实践。张闻天早在1919年8月的《社会问题》一文中,将中国辛亥革命同欧洲旧式的革命作反思性比较,以及对社会不同阶级知识者与劳农界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已经表现出他最初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朦胧意识,而随后他更多身体力行地系统翻译介绍西洋学说和欧美丛书,^[34]努力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刻画自己理解的知识者形象,探索现代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曲折历程。^[35]1920年恽代英在辛亥革命国庆日写的《革命的价值》文章里,将真正革命事业明确为“就群众心理因势利导”,对革命的真诚,“团体

的构成”“分工、互助的联合”。^[36]同时,在知识者与社会的关系上,恽代英认为办教育与社会改造是联系在一起的,“凡人要与社会做点实在的事,都不可不树立一个改造的理想,使多数人在这一致的理想之下分途努力”。^[37]这正是后来恽代英强调首先必须“要求革命的真情实感”,^[38]才有可能产生真正革命文学之思想源流。1925年前后,恽代英全身心地投身于社会政治革命的实践,真切地体验到革命文学不是凭空的想象或单纯的感情冲动。由此,恽代英以社会的政治关怀,满腔热情拥抱现实人生,将文学与革命有机地联系和渗透,也重塑了一代文学家与政治革命家的双重人格。

其三,考察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生成,最初这一作家群体新文学的创作实践和对革命文学的理解,实质上都不在于文学自身的审美表达和其文学理论的建构,而是以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想象来应对社会现实的思与感。他们将文学仅仅作为一种自我思想观念的代言,一种政治视野下主观追求的实践和意识形态化的运作。

自然,我们可以从陈独秀破旧立新的“三大主义”新文学主张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时代气息和革命精神。也能够说李大钊提倡的“为社会写实”的五四新文学具有了某些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元素。更无须说1923年以后,恽代英、邓中夏、萧楚女等一批双重身份的作家与革命者,对于文学应该为社会革命而服务的明确主张,多少引导和影响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生成的走向。张闻天是将思想的认知和文学的创作有效结合得最好的作家。文学家的思想如何通过文学想象、情感具象、叙事和修辞来呈现,张闻天小说、话剧创作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翻译的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之选择,以及其同时期写的《生命的跳跃——对于中国现文坛的感想》《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等文章中观点,都可以看到他对革命文学的探索和其实践之努力。重新审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不论传统大文学的文章学和其文以载道观的继承,还是

现代对外国文学理论文类学的吸收和影响,都有着文学普遍性个人自我与社会人生双面乃至多面融合的问题。当现代中国文学翻开新的一页,五四新文学以大写的“人”的书写和贴近平民大众的白话文的形式表达为基本特征的同时,文学的走向既是属于每个作家的独立思想、自我趣味之表现,又是历史进化、时代演变、社会变革对作家影响作用的结果。为此,纵观陈独秀等这一作家群体对文学与革命的双重建构,在他们身上率先发现文学功能就是社会改革的重要利器之一;文学革新如同社会政治的变革可以相辅相成。这样在他们自己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在鼓动和倡导新型文学的过程中,五四独立、自主、自由、进步、进取的“新人”的现代性塑形和成长受到特别的关注,我们也正是从他们的人生社会经历与文学互动中获得感知。将他们作为一个历史存在的作家群体,一个时代和社会政治的象征,一个助推历史变革前行的代表,这足以提示我们思索五四新文学是什么、现代中国革命文学是什么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笔下的议论随笔杂感有比他们诗歌散文纯粹文学创作更为明晰的思想和观点;张闻天以“旅途”“飘零的黄叶”“逃亡者”“青春的梦”等文学叙事和修辞写他人,写自己,更用生命在书写一个时代新人成长的困惑、迷茫、追求,乃至未来的构想。就此可以看到无论理性的现实的思想还是虚构的情感文学,他们恰恰传达了在一个动荡时代如何经历了由心动到身行的完整过程。

其四,任何典型现象的具体的特殊的时间节点固然重要,可是历史过程中的丰富而复杂形态更有质感的诱惑。我们探讨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起源,特别关注到这批现代作家共同地经历而聚焦着一个动态的历史时段,即思想文化的五四运动、文学革命高潮过后的1920—1923年。正是由他们在这个重要时段里集体无意识地同步参与历史的进程,揭示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自身演进的线路。

比如陈独秀开始反思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

体的活动”^[39]之时,正是他在为一个新的政党创建的时期。李大钊、张闻天等积极参与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恽代英等人创办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也都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在他们看来任何虚无的想象,哪怕是激情的鼓动,面对社会制度的破裂都是无济于事的。唯有组织、联合、互助地实际工作,才能够走出五四低潮的困顿、迷茫,才能够真正接触到五四“人的文学”向着底层的平民大众贴近。当然,五四文学的“人”本身就是多元而立体的,走向也是多线条交叉的。陈独秀等这一作家群体都普遍经历了由“心动”到“行动”的转向,都有一个“文”的革命与“人”的革命互动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多少是现代中国革命文学诸多生成轨迹之一。这里并不是说他们有意为之编排组合起了一个革命文学生成的作家群体。五四文学革命向着革命文学迈进的历史进程中,触发我们避开1919、1921、1925年等重大政治事件的节点考察,而将目光聚焦历史时段动态的行进和他们具体的活动细节,就在于力求更加贴近这样一批作家集体无意识的言和行,发自作家内心的呼唤和自觉革命的践行。从五四文学革命向着革命文学的发展,真正文学的价值恰恰是由“革命”提升和反映了文学自身内部结构的张力。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重心点并不在“国民、社会、写实”的三大文学是什么,而是渲染“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破与立的革命气势之张扬。由此,传达了一种新的文学价值在于“唤醒”“激励”民众对旧文学批判。恽代英等《中国青年》的同仁,“亦相信文学是人类高尚圣洁的感情的产物”,^[40]但是他们更认同文学的现实人生的关怀,将文艺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意识,强调文学与革命实践活动相结合。由此,这批作家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文学功能价值。社会化文学本体一致性的诉求,成为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生成发展的重要推手。这一方面决定于作家精神人格的主体建构,另一方面取决于赖以生存的社会与时代对作家的影响。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五四先觉者

的陈独秀等这批现代作家,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将文学价值理解偏向社会关怀、行动主义,是其共同的特征。同时,因每位作家人生和感受的不同,文学丰裕而复杂的本体,及其价值功能又是不断被开发和拓展的。在历史演进的过程化和文学形态的多样化中,文学史的言说永远是以作家为主体的,陈独秀等这批作家身上的同一性和差异性,既是揭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生起源的某些历史真实,又是确立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参照。同时期的还有郭沫若、成仿吾、钱杏邨、瞿秋白、冯雪峰等另一批作家的积极探求,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由最初的发生,努力向着自身理论建构和其独立本体的深层进发,续写五四文学新的历史篇章!

注释:

- [1][30]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
- [2][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 [3]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5页。
- [4]陈独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1916年5月1日,第1卷第5号。
- [5]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1916年9月1日,第2卷第1号。
- [6][9]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2月1日,第2卷第6号。
- [7]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文集点校》第4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19页。
- [8]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0页。
- [10]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1917年5月1日,第3卷第3号。
- [11]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1918年10月15日,第5卷第5号。
- [12]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 [13]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1918年11月15日,第5卷第5号。
- [14]李大钊:《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人民文学》1979年5月20日,第5期。
- [15]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星期日》周刊,1920年1月4日,社会问题号,第1张。
- [16]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新青年》1919年11月1日,第6卷第6号。
- [17]张闻天:《“五七”后的经过及将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1919年7月11日,第17号。
- [18]张闻天:《社会问题》,《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1919年8月21日,第52号。
- [19]张闻天、汪馥泉:《王尔德介绍·五》,《民国日报·觉悟》文艺栏,1922年4月9日。
- [20]张闻天:《狗的跳舞·译者序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见《张闻天早期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263-264页。
- [21]张闻天:《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篇末附白,《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1月6日。
- [22]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0页。
- [23]任武雄等编写:《恽代英同志生平年表》,《恽代英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81页。
- [24]恽代英:《八股》,《中国青年》1923年12月8日,第8期。
- [25][29][40]恽代英:《文学与革命(通讯)》,《中国青年》1924年5月17日,第31期。
- [26]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1923年12月22日,第10期。
- [27]沈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11月6日。
- [28][38]恽代英:《〈中国所要的文学家〉按语》,《中国青年》1925年5月16日,第80期。
- [31]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1918年12月22日,创刊号。
- [32]李何林:《五四时代新文学所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北京:新建设杂志社,1951年,第19页。
- [33]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每周评论》随感录栏,1919年4月20日,第18号。
- [34]张闻天:《对于中华书局新思潮社管见》,《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22日;张闻天:《译名的讨论》,《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4月17日。
- [35]见张闻天的小说《旅途》《飘零的黄叶》中钧凯、长虹等人物形象的塑造。
- [36]恽代英:《革命的价值》,《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0月10日。
- [37]恽代英:《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中华教育界》1921年4月20日,第10卷第10期。
- [39]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1920年4月1日,第7卷第5号。

[责任编辑:李本红]